

王修智 张华
主 编

◎ 李泉 王云 著

山东运河文化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院齐鲁文化研究丛书



齊魯書社

王修智 张华
主编

◎ 李泉 王云 著

山东运河文化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院齐鲁文化研究丛书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东运河文化研究/李泉, 王云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11

ISBN 7 - 5333 - 1735 - 1

I. 山... II. ①李... ②王... III. 大运河—流
域—文化史—研究—山东省 IV. K928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68 号

山东运河文化研究

李泉 王云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06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33 - 1735 - 1/K·543

定价: 25.00 元

总序

王修智

齐鲁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地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后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思想理论精髓的形成、发展期，是一个呼唤历史文化巨人且历史文化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这些历史文化巨人基本都集中于当时的齐鲁两国，其思想理论成果不仅全面总结继承了此前三千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文化成就，而且成为此后二千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在齐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主体出自于齐鲁文化。加强对齐鲁文化的研究，对于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体系及其特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规律，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思想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对齐鲁文化的研究。所谓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贯穿于春秋战国和秦以来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但是，将齐鲁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进行研究，则是始自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十余年来，齐鲁文化研究日趋深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面对新时期继承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要认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紧紧围绕齐鲁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力求通过争鸣取得更多的共识，推动齐鲁文化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一、齐鲁文化产生的背景

关于齐鲁文化产生的背景，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作过许多精辟的阐述。比如，通过对古山东地区的地理环境、灿烂文化尤其是东夷文化、古史神话传说的研究，追寻齐文化和鲁文化赖以产生的地域地理条件和文化人文条件；通过对齐鲁两国与西周王朝的关系、两国的地域地理条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两国国君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的差异的研究，探讨了齐文化、鲁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各自的不同特点；通过对周公、姜尚、管仲、晏婴、孔子、孙武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探讨他们对齐文化和鲁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对两国文化走向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比较充分地说明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乃至民风民俗方面的背景，展现了齐鲁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范围产生的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但是，现有的这些研究成果，还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齐鲁文化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继而对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历史文化巨人都是时代思潮的代表，既不可能割断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更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这是思想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有异于或者说

超越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域文化，正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潮的洪流。

首先，要从此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文化传统中，探寻齐鲁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文化的产生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进步的历史过程。齐鲁文化与此前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周文化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孔子说“礼”，认为殷对夏、西周对殷皆有所“损益”。他本人于春秋末对周礼也有所“损益”。所谓“损”，就是抛弃不合时宜的成份；所谓“益”，就是继承和创新。孔子一生“据鲁”、“亲周”、“故殷”，整理“六经”，其主要贡献就是直承中国悠久传统尤其是西周文化传统，并有所“损益”，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儒家学派。只有放眼此前三千年，从历史文化的传承上观察齐鲁文化，才能追根溯源，深刻认识齐鲁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深远背景。

其次，要从春秋文化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中探寻齐鲁文化产生的现实社会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发展大转折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它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随着西周王朝的衰微，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失去效能，周王对各诸侯国、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五霸迭起，战乱不止，社会秩序大乱，即司马迁所说的“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史记·太史公自序》）。另一方面，它又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羁绊，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人士不断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发表各自的见解。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在全社会不断渗透、扩展，逐步形成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思潮。春秋文化思潮的涌起可视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是不彻底的)，它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统治秩序和思想意识形态，为齐鲁文化的产生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文化营养，创造了生动活跃的社会环境。

因此，齐鲁文化既是对此前中国三千年文化传统有所“损益”的成果，又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晶。只有以宽阔的胸怀和视野，从历史与时代的结合上审视齐鲁文化，我们对它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齐文化、鲁文化与齐鲁文化体系

齐文化、鲁文化是从同一条母根上孕育成长起来的两枝风格迥异的文化奇葩。齐文化理论驳杂，各具特色，从姜尚、管仲、晏婴、孙子到黄老刑名、阴阳诸家，并无一个清晰的思想传承体系；而鲁文化中的孔子、墨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虽各有异，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路（孟子、荀子是齐文化中人，但为儒学中坚，似仍可视作鲁文化的继承发展者）。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大阵营的思想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学说而互相攻伐、纷争不已，甚至在阵营内部也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但是，如果把齐文化和鲁文化放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去审视、去分析、去比较，就会发现，看似内质差异巨大甚至许多学说观点针锋相对的齐文化和鲁文化，其实在更深层次上却是相似相通的，同属一个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指的是若干有着大体一致的价值目标和实践目的的思想文化成果相互联结而构成的一个整体。齐文化和鲁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整体。

“王政”与“霸道”——对立统一的政治思想。“道”，即以仁义为内核、礼乐为形式的“王政”或者“王道”，是孔子

理想中的社会政治模式。齐鲁两国由于治国理念、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道”的文化取向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刘向之《说苑·政理篇》曰：齐“博贤者先疏后亲，后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意思是说，齐、鲁两国在讲仁讲义讲亲亲讲尊贤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内外先后之别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即鲁国的王者之迹，齐国的霸业武功。齐国成就了霸者之业，但并未脱离“王道”、“王政”的规范，其霸业武功（包括其文化）实属“王道”、“王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需进一步采用鲁国的政治理念和礼乐规范，即可达到理想境界。鲁国虽有“王者之迹”（即周礼），但缺少齐国的尊贤尚功，因此也未能成就霸业，达到孔子所理想的“王政”、“王道”。可见，代表齐文化的“霸道”与代表鲁文化的“王政”，二者既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内在统一的、递进的。正如孔子所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到了汉代，齐鲁文化合流融合，王霸之道同时被“汉家制度”吸收兼容，则从实践上为齐鲁文化可以整合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文化体系做出了佐证。

“同归于正”——互融互补的本质特征。春秋乱世，齐鲁两国思想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但其根本出发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司马谈评论六家要指时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案：“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途。”这就是说，六家理论虽然各成一派，纷争不已，但都是经世治国之

说。合六家之长，去六家之短，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治国之道。司马谈所论的六家，基本都出于齐、鲁两国，因此这也是对齐鲁文化中诸家学派核心理论和诸子学说的概括与总结。其中一句“务为治者也”，既准确地揭示出诸子百家学说契合社会现实、服务社会现实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准确地揭示出齐鲁文化“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同归于正”的发展走向和演变规律。因此，不论齐鲁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存在多么大的差异，其学理和论说仍在经世致用的大目标下相辅相成，共存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之中，并成为汉代大一统社会政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把齐鲁文化视为一个文化体系，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力图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融贯众说，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齐鲁文化、研究齐鲁文化。这样做，一是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齐鲁文化，系统地研究齐鲁文化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阶级阶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各诸侯国的文化政策的关系，对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二是有利于更好地学习研究齐鲁文化中各家各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理清他们在横向上的承继关系和横向上的交互影响，对他们在齐鲁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公允的评价；三是有利于从更高的层次上，把齐鲁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深刻认识齐鲁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

三、齐鲁文化的性质

齐鲁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它符合当时和此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是推动中国社会繁

荣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所蕴含的超越历史、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思想文化精华，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的发展进步仍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齐鲁文化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契合社会现实的理论创新意识。齐鲁文化的思想家们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大胆标新立异，致力于理论创新。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最基本的趋向（即“形上学”层面），可以概括为对天道、人道和天人关系的探索。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为孔子和老子。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继承了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思想精华，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创建了关于“仁”的学说。虽然他对天道学说（大致可概括为“义理之天”）和天人关系学说阐述不多，但他在发现人的本质基础上建立的伦理道德学说和在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建立的“礼乐之治”（或曰“王政”）学说，不仅成为儒家学派基本理论的滥觞，而且经其后学尤其是孟子、荀子发展充实后，到汉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社会政治理论和文化制度的主干。孔子和儒家学说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深层次上契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老子是齐鲁文化圈外学说体系最为完整的文化巨人，其思想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长于天道（“自然之天”）。在人道方面强调“无为”实“无不为”，在天人关系方面要求人应顺应大道。老子学说博大精深，但落脚点仍在人道，究其根底是一种治国理民之术，因此有人将老子学说称为老子版的“内圣外王”之说。孔学“迂阔”，老子“空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尚且如此紧密，其他如管仲、晏子、孙子、墨子和稷下诸先生的学说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更勿详论了。

二是俯仰天地的人文情怀。发现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的身心内外、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天人关系，是齐鲁文化中各家各派思想家理论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当然，他们当时对人的论述，还没有达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高度，也没有像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那样讨论人的权力，更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科学地揭示人性和人的本质。但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他们就能够自觉地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活，同情人的命运，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培养人的健康人格，并以人为中心建立各自的理论学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些关于人的理性思考，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占据着世界各文明国家有关文化理论的制高点。尽管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秦汉以后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制约，齐鲁思想学家们所论述同情的“人”一旦进入社会政治制度领域，就会备受搓揉挤压，就会被大大矮化，但是贯穿齐鲁文化的人文情怀的光辉，依然超越时代照耀后世。

三是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齐鲁思想家尤其是儒学思想家们，在论述“人”时，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主张教育人、培养人，使人“成人”，养成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所谓“内圣外王”，所谓“修、齐、治、平”，讲的都是人只要经过自身努力，养成健康的人格，就有可能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尧舜，就有可能“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易》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道喻人道，鼓励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孔子曰“成仁”，孟子论“取义”、“大丈夫”、“浩然正气”，至今读来仍令人回肠荡气。儒家学说是积极入世的学说，积极入世的人

是与社会、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因此，个人的奋发进取必须以“利他”为出发点，融入集体和国家的价值目标之中，即要有拯世救民的博大胸怀，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德操，要有为国家和民族不惜抛弃一切的牺牲精神……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齐鲁文化先进性的体现，而且作为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止。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劫难仍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精神之源，是我们今天应当倍加珍惜和大力继承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宋人张载说，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远大的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这句名言来表述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思想家们的宏图大志，是最为合适的。他们直面时代课题，一旦登上社会历史这个大舞台，就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和囊括天地、笑傲王侯的雄伟气概，开宗立派，创制立说，拯世救民，开创未来。他们的志趣、境界、价值指向，决定其理论学说的深度、广度和目标指向，决定其学术活动的经世致用特点。孔、孟、荀儒家一派注重理论建构，其学被称为儒术，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管仲、晏子、孙子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学和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墨子及其后学不仅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等等，而且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法家、黄老刑名是社会政治领域最直接的统治术。阴阳与名家被人视为口舌之利之徒，但是司马谈仍认为一个“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一个“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是经世致用不可缺少的理论。齐鲁思想家们既是理论的创造者，又力图成为理论的实践者。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和

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纷纷奔走列国，兜售自己的理论学说。这种为人为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肯定齐鲁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的性质，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先进文化必定是源于社会现实又高于社会现实，能够解决社会时代重大课题，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并且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充实提高；另一方面是以史为鉴，通过对齐鲁文化性质的认识和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某些启迪。

前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境内就有了人工开挖的运河，但是直至元代以前，这些运河或是区域性的、历时短暂，或只是从山东边境地区流过，在全国运河交流网中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元代开挖会通河，明代对其进行改造修整，使山东运河通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东运河文化。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全程 1700 多公里，其中流经山东的会通河与卫运河近 600 公里，大约占了运河全长的三分之一。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转输经于此，较漕运数量更多的南北物资交流经于此，南方各地官民人等来往京城经于此。山东运河地形复杂，水源匮乏，且常受黄河侵害，所以对山东运河的浚治与管理，历来是封建王朝的要政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山东运河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一向为学术界所重视。

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界就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讨论历史上运河河道的变迁。三四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逐渐多了起来。1944 年史念海先生出版的《中国的运河》，同年全汉昇先生出版的

《唐宋帝国与运河》，是这个时期运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进入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大型水利工程不断兴修，对京杭运河的治理逐段展开，京杭运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继续发表文章，对于运河的沿革与变迁进行讨论。六十年代初，许多学术刊物、报纸都有评价隋炀帝开挖大运河、运河漕运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中华书局出版了于耀文的《漕运史话》、朱契的《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超华的《大运河的变迁》。总的说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家所关注的重点是运河的开挖、沿革、管理及交通、漕运等问题，既无专门论著研究山东运河，更无人从文化的角度讨论运河问题。

自政府着手论证、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以来，出现了京杭运河史研究的热潮，学术论著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范围扩大，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出版了几种全面研究运河史的著作，除史念海《中国的运河》一书于80年代再版外，常征、于德源的《中国运河史》、岳国芳的《中国大运河》、邹宝山《京杭运河的治理与开发》、姚汉源《京杭运河史》、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相继出版。有关运河河道与工程等问题，仍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举凡历史时期、各个地区运河开挖、修治、运河工程、运河经营管理、河道管理机构、闸坝建设等等，都有专文讨论研究。对漕运和漕政的研究更加深入，漕粮征收、漕运机构、漕仓设置、漕运功能等，都纳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除大量论文外，还出版了几部颇有功力的专著。不少

学者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商业流通状况，从城市史的角度研究运河区域城市发展与商业城镇兴衰。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以山东运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邹逸麟先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的初探》（《历史地理》1981年第1期），对元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的河道变迁、水源闸坝、沿线地貌变化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精当的论述。其他如山东运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运河城市兴衰的个案研究，也都有不少成果发表。

近十几年来，运河文化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1997年5月，山东省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和聊城市共同组织了“运河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就运河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山东运河文化文集》，陈之安先生等提交的《运河文化论纲》一文，第一次从宏观上概括了运河文化的内容，指出大运河将自北向南分布着的几个文化圈串连了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容纳了各个文化圈的特色，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2001年9月，安作璋先生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出版，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运河文化的通史之作，举凡大运河开凿疏浚治理，运河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运河区域经济发展、学术文化交流，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和研究，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运河文化发展的全貌和轨迹。这部150万字的巨著，摆脱了长期以来就运河而研究运河的窠臼，将京杭运河置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视野中来审视，标志着我国学术界运河史研

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山东运河文化秉承齐鲁文化的基因，融汇南北文化的精髓，内容繁丰富赡，在这本书中，我们只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选取其中最为切要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究。山东境内的古运河特别是元代以后的会通河、卫运河的通航，改变了山东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山东运河是运河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物化的文化现象，所以书中首先对古代山东境内运河河道变迁及工程管理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说明。漕运是封建国家的治国要务，漕运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我们关注漕运本身，更关注它对山东运河区域的影响——南北经济交流、人口数量结构改变及社会风气变化。山东运河城镇分布密集、经济发达，本书在考察描述运河城市基本面貌的同时，力求揭示山东运河城市独具特色的空间结构及城市文化的特点。运河给山东西部地区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商业繁荣，已有的研究多从商品经济和市场结构的视角作静态解析，缺少对商人商帮动态活动的研究，我们力求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考察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市场网络体系的架构，同时更注重探讨各地商人商帮在鲁西地区的分布与经营，进而说明山东运河商业文化的特点。对于山东运河区域的文风与文化交流，既作了面上的、宏观的考察，又进行了重点的、微观的分析，先从科举与书院两个方面探讨运河畅通对鲁西地区文化的促进，然后选取了海渊阁和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作了个案研究，以期更加精详地把握南北文化在这一区域的交流与融合。